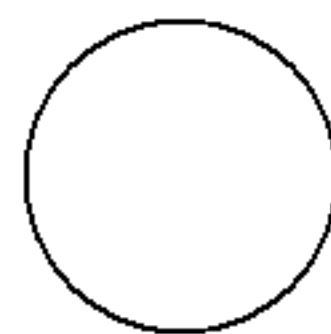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5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五期 ★

目 录

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党校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维·乔·威尔科克斯 (1)

把思想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本刊评论员 (14)

做好工业企业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李 野 (21)

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车间党支部张 高 (23)

加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东方明 (29)

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杨 均 (34)

南斯拉夫有着怎样的“创作自由”?牧 惠 (39)

不可救药的“肌肉僵化”症洪 谷 (46)

爬不出死胡同秋 阳 (47)

美元·链条·朋友淳 林 (48)

☆ 三月十七日出版 ☆



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 党校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維·乔·威尔科克斯

同志們：

今天能到这里向同志們讲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光荣。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而且是由我担任总书记的新西兰共产党的光荣。新西兰共产党正在资本主义世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通过正确的政策和实践，为今后向社会主义的新西兰前进准备道路。你們将会看到，我們面临着許多困难。我們取得了一些成就，也犯了一些錯誤，我們正努力从其中汲取經驗教訓，以便在今后的理論和实践中消除这些錯誤。我們按照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經驗和認識，把馬克思主义理論运用于我們本国的条件。对于任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來說，另外的道路是沒有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走上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道路。所以，我們党的綱領是从新西兰的条件出发的，同时也运用了列宁領導的一九一七年偉大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我們运动中的世界范围的經驗。

我們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們的世界性运动最近的两个文件：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一个党声明。修正主义者胡說什么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已經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用不着經過世界性的集体考虑，而只要根据苏共領導的請求，就应该整段整段地抹煞或者片面地修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一个党声明，我們拒絕听从这种胡說。修正主义者說什么为了挽救在南斯拉夫仍然存在的所謂“社会主义”，应该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弄回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而他們用不着放棄他們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活动，我們拒絕接受这种修正主义的概念。修正主义者說，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已經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在我們的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現在的主要危險是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我們也拒絕接受这种思想。

不！我們坚定不移地根据我們的認識，在我們所在的资本主义世界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我們由于这样做，在新西兰国内和在別的国家中，树立了不少敌人，但是我們也找



到了許多朋友。今后我們还会获得更多的朋友，而敌人将会后退，并最后被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則的攻势所击败。

同志們，

正如八十一个党声明所說，我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衰落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今天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形势不仅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新的問題。新的困难在我們的世界性运动中，同时也在每一个共产党的內部，引起了尖銳的矛盾和斗争。任何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当因此而泄气。如果没有困难，没有矛盾和斗争，我們就不能前进。如果我們不認識这一点，那么首先就会停滞下来，然后就会后退。如果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还像牛吃草的时候那样安詳自在，希望用不着我們的帮助，時間就会解决問題，那是沒有用处的。不，我們必須战斗。無論誰企图把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得最后变成资产阶级的理論，我們都必須反对。新西兰共产党去年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決議中認識到了这一点。我們正在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进行斗争。在我們的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今天采取这个立場的人一定会取得胜利，現代修正主义将被击败。

今天出现了这样的看法：由于社会主义世界力量强大，前进的道路已經变得很平坦，大体上只須依靠社会主义世界就能贏得社会主义，而用不着依靠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的有組織的战斗。由于这样来看問題，作为各国内部变革的动力的阶级斗争就越来越不被重視，而阶级合作思想在国内政策和国际事务中都在增长。这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列宁所反对的也正是这种修正主义。它的基本思想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所提出的思想是相同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可能用不同的語言来表达它，他們可能用关于“新时代”的言論来加以掩盖，但內容还是老一套。

帝国主义世界正在出現新的矛盾。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欢迎和利用这些矛盾。但是，修正主义者是不是主張这样作呢？不。他們要不是說看不到什么新的矛盾，就是故意加以抹煞。他們把衰落中的帝国主义看成是磐石一块，因而企图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整体来同它打交道。帝国主义的法国正在向美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进行着規模虽小而意义重大的挑战，在修正主义者看来，这不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不是一件有助于我們的运动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进展的事情。不！在他們看来，这是一件坏事，应该給予主要的打击。結果是，他們把法国帝国主义看成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要我們集中力量反对它。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这种主張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們是在帮助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美帝国主义保持它目前在帝国主义陣营中的統治地位而不受到挑战。

从帝国主义內部的分化日益增长这个問題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現代修正主义实际上起的是什麼作用。由于修正主义者錯誤地把帝国主义当作磐石一块来同它打交道（對他們來說，



这实际上就是同美帝国主义者的头子打交道)，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保护美帝国主义及其利益，而反对其他帝国主义。我们的捷克同志之所以攻击中国在现阶段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一点吗？当然是的。我们要问，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什么时候起是这样行动的？难道斯大林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出，帝国主义阵营将会再次出现重大分歧，我们应当欢迎这些分歧，并且为了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利用这些分歧吗？谁对呢？是那些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整体，实际上同帝国主义妥协，幻想它会和平地趋于衰弱和死亡的修正主义者对呢，还是斯大林对？当然是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确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同今天修正主义者的错误比起来，他犯的只是小小的、不重要的错误。一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是斯大林，不是修正主义者。

同志们，

我简单地谈了一下我们的世界性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在怎样试图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把它变成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词句外衣的资产阶级理论。如果他们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并且为此还偶而继续提出一些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研究一下考茨基就能看到，在他已经从马克思主义阵营投向资产阶级阵营后，正是这样作的。列宁当时揭露了这种狡猾的手法，我们也必须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手法。修正主义者大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只要可能，每三个字就要提到伟大的列宁，但是，当必须把他们的言词付诸实践的时候，这些修正主义者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不见了！

在对待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上，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说法，似乎民族解放斗争正在接近收场，似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根本不对。成亿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或者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帝国主义仍然是决定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压倒一切的因素。修正主义者拒绝正视日益增长的新殖民主义危险，因为这样作会使他们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他们假装相信帝国主义正在温文尔雅地消失。他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经济援助”同帝国主义进行和平竞赛。他们在印度就是这样作的。苏共领导硬是不肯把印度看成是一个越来越处于美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在尼赫鲁和国大党领导下仍然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印度国大党今天的政策是反动的，它帮助帝国主义，阻碍印度获得真正的独立，导致印度人民群众的进一步贫困化。但是，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却讨好尼赫鲁，给他提供援助，这种援助被直接用来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硬说中印发生边界争端是中国的过错；尽管没有一个亚洲或东南亚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非社会主义国家）相信修正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这样说。实际上这不是别的，而是在帮助美帝国主义打进印度，是在加强当代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是在加强拥有大量原子武器并且每天都在威胁世界



和平的一个国家。

修正主义者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世界和平，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在加强那个在目前和将来都构成主要危险的势力——无论是就世界战争来说，还是就局部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来说都是如此（进行这些局部性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推进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加强美帝国主义用援助和武装部队对亚洲、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动政权的支持）。

这是行动中的修正主义。

不仅如此，在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修正主义者是否关心争取解放的力量的胜利呢？不，他们所操心的主要是寻找一条同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和平道路。最近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对于我们新西兰党有些什么影响？

长期以来，许多同志以为这个问题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认为国外修正主义的发展不会妨碍我们去贯彻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政策（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这些同志以为这个问题可以让别人去解决，我们虽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可以站在斗争之外。

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义务意味着，我们必须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战线上，在我们的世界性运动中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这一点很快地也变得明显起来：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使我们在新西兰推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受到了阻碍，增加了困难。

我刚才谈到了有人把帝国主义当作磐石一块来同它打交道，而忽视帝国主义内部分歧的增长。我也谈到了这个概念怎样使某些人认为，人民中国不应该承认帝国主义的法国，因为法国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想要向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进行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新西兰采取了根本不同的政策。我们不仅欢迎法国承认人民中国，而且并不认为法国帝国主义由于打算在太平洋试验核武器（从而蔑视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立刻变成了最反动的势力，变成了沿太平洋沿岸各国在现阶段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主要打击对象。可是，沿太平洋地区的某些在修正主义领导下的党却正在这样做。这些党正在转移反对今天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美帝国主义的火力。这些党要求抗议法国进行核试验，但是却不开展有效的运动来争取全面停止核武器的一切试验、制造和储存以及销毁现有的核武器，实际上只有这样做才是防止核战争的唯一有效的保证。这些党认为中国政府关于采取这种行动的呼吁时机不成熟。显然，这些党正在开始接受美国关于只许有两个核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建议，而且还装作相信这是世界和平的可靠基础。



我們的党說，是的，我們应当抗議法国在太平洋上我国的大門口进行核試驗，但是我們也必須說清楚，主要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它在我国的大門口也試驗和改进过原子武器。

我們在抗議法国进行核試驗时，应当把这种抗議同要求停止一切核試驗和銷毀全部核儲存联系起来。修正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这样，目前在新西兰国内以及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党之間的統一行动受到了修正主义的破坏。

对于南太平洋各国，以及太平洋沿岸各国來說，馬来西亚問題是当前的迫切問題。我們新西兰的政府同澳大利亚政府一样，已經承担了义务，如果接到要求，就得援助英帝国主义的傀儡拉赫曼的武装部队。我們面临着随时都有被卷入同我們北方的邻邦印度尼西亚发生战争的危險。但是，修正主义者是不是承认这是一个迫切的危險呢？不，他們关心的只是集中火力对付法国帝国主义。他們沒有認識到，这个問題所关系到的是，英帝国主义同目前居于統治地位的美帝国主义正在重新进行更加公开的冲突。美国不願意让英国在馬来西亚真正获得成功，它要自己的帝国主义势力在那里占据主要地位。因此，美国最近派了罗伯特·肯尼迪进行活动，同苏加諾进行会談，等等。美国的行动并不是真正为了維持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和平，而是想抑制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当然也想扩大自己的利益。幸运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認識到可以利用这些分歧，但是修正主义者却看不出这种局势有可資利用的任何可能性。

新西兰現在的形势如何呢？我們的政府已經保证，如果接到要求就用武装部队援助新出籠的馬来西亚；但是它也清楚地表明，它不希望被要求来这样做。原因是明显的：英帝国主义已經不再能支配新西兰的外交政策了。新的因素，即美帝国主义在我們地区中的影响，出現了。結果是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不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們的党当然能够利用本国統治階級内部所出現的这种分歧。我們的党能够利用这种形势，依靠不仅激起工人階級的反对，而且也激起資產階級某些部分的反对，来保证不派军队到馬来西亚去。太平洋各国的修正主义者能够看到这一点嗎？不，他們不能，因为他們只把帝国主义看成磐石一块。对于他們來說，在这个“新时代”，帝国主义内部的分歧是不存在的，要不就是不重要的。

对于我們新西兰來說，一个根本問題是對待社会民主主义的正确战略和策略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修正主义者采取的是什么立場呢？他們把社会民主主义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以工人階級群众为基础这一点，同工人階級群众的思想意識混为一談。事实上他們开始这样来爭辯：如果一个工党，其黨員中的压倒多数是工人，那么，它的政策就必定具有工人階級的观点，或者至少它会采取正确的政策，而用不着进行一場意識形态的斗争来爭取工人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和認識到有一个共产党的必要性。事实上，他們硬要抹煞这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曾經領導劳动人民和他們的同盟軍取得政权和建立社



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进行了坚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的地方，才做到了这一点。现代修正主义者断言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情况已经同过去不同，现在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了，只要在这里和那里作某些微小的补充，就可以有办法通过议会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了。事实上他们是说，我们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期望依靠工党加上少数共产党党员的协助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导致了对有关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正确概念的否定，而且，事实上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道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共产党内一度出现的白劳德路线，曾经建议采取组织步骤来取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有效的共产党组织。许多今天的修正主义者当时曾经反对过白劳德路线，现在他们却走上了白劳德的道路。他们至多把工党当作一个两个阶级的政党，但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两个阶级的党。他们拒绝向列宁学习，列宁曾斩钉截铁地指出，社会民主党，工党，是资产阶级政党。

新西兰共产党不以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主义。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必要同各个阶层的工人，包括那些受工党影响最深和支持工党的工人，在当前的斗争问题上合作和团结。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进行这种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也必须继续不断地进行思想工作，把工人争取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使工人懂得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永远不能领导工人到达社会主义，而只会加强资本主义的束缚。我们同这些阶层采取统一行动，但是在思想上我们却不同他们统一。相反，我们有力地指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还指出为什么必须加强共产党和扩大它的影响，才能有效地领导争取社会主义的新西兰的斗争。

换句话说，同社会民主党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是既有团结，也有斗争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左倾宗派主义者，说我们不懂得世界形势已经改变。他们说我们不懂得，正像帝国主义的本性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改变，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也变了。照他们这样说来，列宁已经过时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子们，特别是考茨基，当他们一旦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们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时强大的帝国主义世界的新条件），就很快地从修正马克思主义转到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切方面，很快地变成了我们所理解的社会民主党人。大约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一六年期间，他们大多数人都落水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还抓住马克思主义不放。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者，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除非他们迅速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来，他们也将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变为完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方面的人。他们将变成我们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工党头子那样的热心的社会民主党人。

今天某些欧洲的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地步了。对修正主义



者来说，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間是没有中間道路的。

这样看来，在有着社会民主主义傳統的国家內的这些共产党，事实上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呢？至多不过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左翼，是资产阶级用来多少延长一下自己的阶级特权地位和对群众的剝削的一个有用的工具而已。在帝国主义衰落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这个时代，它們呆在帝国主义的强大据点里帮助帝国主义多活几天。

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問題上的錯誤思想，对工会运动（列宁曾把工会称为工人斗争的群众机关）的政策和活动立即产生了影响。

新西兰曾經被列宁称为第二国际的天堂。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当时的自由党—工党政府就通过立法，在我国創立了所謂工人资本主义和所謂福利国家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現了工人和资本家通过政府的立法在劳资关系方面进行阶级合作的思想。对于多数工人来说，劳资調解和仲裁机关成了提出增加工資、改善条件等要求的唯一途徑。統治阶级成功地散布了这种思想：在任何劳资糾紛中，如果工人和雇主达不成協議，工人总是可以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所指定的人来作出公平的裁决。不言而喻，这种所謂的裁决总是有阶级性的，也就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裁决。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工人的头脑里保留了一些强烈的幻想，如“由资产阶级国家作出公平的裁决”。这种幻想一直到現在仍为多数工会所接受。但是，最近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加深已經开始更直接地影响到新西兰的經濟。虽然我国的生活水平仍然可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高的，但是工人、小农、小商人的生活水平同十年或十五年以前比較起来是降低了，而且还在繼續下降。国际壟断资本对新西兰的滲入日益加强，加上我国經濟依赖于农牧业产品的出口价格（在今天的世界市場上，价格是不稳定的），这意味着物价上漲，生活費用上升，而收入却没有增加。在工会运动中，这种情况已經促使产生一种更富有斗争性的政策，开始出现争取打破阶级合作窠臼的全国性运动，和更广泛地使用罢工武器来对付雇主阶级。去年参加罢工的工人是許多年来最多的一年。对于我们党在工会运动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展更进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现在的条件变得更有利了。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修正主义的思想，我們就不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上层同帝国主义合作，等待帝国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被賽垮，这必然导致在我們的国内事务中接受阶级和平的思想，而不是接受阶级斗争的思想。

因此（让我擱下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問題），无怪乎当我们坚持說今天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是在亚洲、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时候，这些修正主义者說我們的主張違反我們世界性运动的总路綫。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进行双边会談的时候，苏斯洛夫就是这样对我们說的。从什么时候起，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下一次的突破、社会主义的另一个



进展将在帝国主义强大的地方发生呢？实际上，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上取得进一步成功，将大大帮助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帮助我们粉碎我国工人头脑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堡垒。

在实际生活中，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以及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我们说的是这样：找帝国主义强大的地方去突破。这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这意味着他们离开革命。无怪乎他们要同帝国主义调和。

现在回过头来谈社会民主主义。列宁在很多年以前就概述了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队伍中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原因。他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由于对自己的新殖民帝国的超额剥削，能够用给他们稍高的生活水平和有钱人的残汤剩饭的办法，来收买本国的部分工人。他们能够用阿谀奉承、名誉地位和直截了当的贿赂来收买工人领袖。他们可以这样做而根本不影响自己的利润。事实上，阶级斗争的削弱，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散布阶级合作和阶级和平的理论，对他们总是大有好处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中制造出来的。

在帝国主义衰落的现阶段，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在工人中的政治表现，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如果列宁是正确的话（我们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当预期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理论也会没落吗？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修正主义者不同意。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衰落的时代，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存在，但是也像帝国主义一样在发生变化。他们现在说，由于帝国主义的虚弱，可以使它接受和平政策，而且使它不进行挣扎就文雅地死去。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工党，将会成为这样的政党，我们不仅可以在某些有限的问题上为了群众的利益而同它们联合和合作，而且在在我们本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也可以同它们团结。

这完全是胡说！随着帝国主义世界内部斗争的加剧，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都将变成越来越恶毒的资本主义僕从。必须把支持它的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观点，支持共产党。显然，帝国主义的没落很自然地会产生同列宁在帝国主义上升的日子里所看到的现象相反的东西，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队伍的控制正在缩小。新西兰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工人群众已经不再期望工党解决他们的问题，更不期望工党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而在过去的年代里，工人群众是这样想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还能控制工人，只是因为工人对它还抱有一点希望，希望社会民主党也许会比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稍为好一点。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希望也消失了，许多工人支持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去了。分析一下新西兰上两次大选的结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使工人脱离一切资产阶级理论，接受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支持马



克思列宁主义。仅仅由于工人仍然构成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而錯誤地号召在一切方面，包括意識形态方面同它团結，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但修正主义者恰好是在这样做。不！只有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在当前問題上、在行动中、在斗争中同它团結，从而提高工人的認識，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工人将通过自己的經驗認識到，除非工人进行斗争，今天的資本家将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不会作任何退让；認識到，没有一个資本家会不經過斗争就把政权交給劳动人民及其同盟者。工人将学会思考共产党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即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观点。

这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主要問題的資本主义世界中加强共产党的道路。这是走向胜利的道路。修正主义的道路是走向取消共产党的道路，使共产党不能起任何独立作用，或不能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这个問題不仅对于我們新西兰，而且对于我們的整个世界性运动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迄今为止，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工人队伍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各国，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經基本上解决了社会民主党的問題。可是当我们参加莫斯科双边会談的代表团提出这个問題的时候，代表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是怎么說的呢？

他說：“为什么責备我們？这是你們的問題。你們必須去解决。”这算是什麼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难道我們对于东南亚爭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能够說这不是我們的問題，因此同我們无关嗎？当然不能。这同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都有关系，因为在所有这些問題上集体地采取正确的政策，意味着我們將实现八十一个党声明所指出的目标，即：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你瞧，在我們的莫斯科会談中看得很清楚，当这些修正主义者不願意討論这个問題的时候，就說这是你們的問題。但是，当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向我們談話快要結束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地說：你們是錯誤的。我們曾經希望你們会改变。如果你们改变，你們将能留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队伍中。但是，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末，当然，你們将被排除在外。

換句話說，社会民主主义是我們的問題，但是誰留在兄弟党的队伍內，这要由他們来决定。

此外，我們談到，他們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对世界其他共产党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們正在采取一种我們只能归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当我们那样說的时候，他們作不出有力的回答。我們在会談中还說，在我們看来，你們的想法是，你們要靠剝削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办法向共产主义前进。換句話說，他們要騎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共产党的背上走向共产主义。当我们那样說的时候，他們作不出



有力的回答。但是，隔了一会儿，我們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回答呢？实际上是說：威尔科克斯同志，我們对于新西兰共产党采取的立場，对于你們领导的立場深感不安。你們是小国沙文主义。

无论如何，說苏共中央领导同制定一項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队伍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共产党政策这件事没有关系，对此沒有責任，那是錯誤的。苏共在我們的世界性运动中过去居于特殊的地位，从一九一七年偉大十月革命以来他們起了特殊的领导作用，正因为如此，苏共领导人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所执行的总政策就意味着他們大大地助长了下面这种修正主义思想：把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群众中进行工作这个策略問題，同实现击败工人队伍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并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来代替它这个战略目标混为一談。同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他們是不能逃避这个責任的。

让我再說一遍，在新西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使共产党作为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繼續存在的斗争。这个根本問題关系到我們的政策的各个方面。

根据我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經驗，如果他們对我說黑的是黑的，我仍然会想一想那也許是白的，并认真地看一看。这是因为他們的确什么事都要撒謊，而且讲的非常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剛才我談到了关于战胜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这就提出了另一个問題：今天我們的世界性运动的根本战略和策略目标是什么。

新西兰共产党认为，我們的世界性运动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壟断資本、帝国主义，使工人階級取得政权，然后建設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策略集中点是防止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特别是核战争。我們去年九月在莫斯科进行双边会談时就是这样說的。

但是当我在莫斯科提出这一点的时候，苏斯洛夫是怎样代表苏共中央回答的呢？他說：“你們知道，防止热核战争的問題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世界共产党人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說：‘各国共产党把爭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坦白地說，你們是不是这样想的呢？这同你們的讲话差得很远。你們貶低了爭取和平的斗争的作用，但是八十一个党的声明說，战争与和平的問題是当代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首先是世界工人階級，担負着防止世界核战争的重大責任。爭取和平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策略問題，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基础之一。”

同志們，我們的態度是經典的馬克思主义态度，尽管去年九月他們在莫斯科讲了那么多的話，我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态度。苏斯洛夫的概念为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打开了通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战略目标，不仅从当前的策略來說，而且从战略观点來說，变得不重要了，別的东西代替了它們的地位。下一步就会是不惜一切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全



面妥协并最后投降。

在新西兰，这个问题对我们党具有迫切的重要性。在争取世界和平和推动新西兰人民为此目的作出最大努力的斗争中，以及在促使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方面执行和平政策的斗争中，牵涉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我们应该把反对帝国主义的各个方面的活动和影响作为争取和平斗争的基础呢，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活动局限于某些形式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我们采取后一条道路，我们就会把争取和平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领袖，我们自己的观点也会变成和平主义的观点。我们会忽视帝国主义的本性（这种本性就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很快我们就会开始谈论某些帝国主义头子的和平意愿，过高估计最高级谈判的重要性，而低估工人阶级的作用，低估群众在争取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将会离开我们党的战略目标（即推翻帝国主义），而不惜任何代价把和平当作我们的目标。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已经这样做。这当然不会导致和平，只会导致战争。帝国主义者是没有和平意愿的，他们不是宽大为怀的。帝国主义者欢迎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把这看作是我们的世界性运动中存在弱点的表现。这时，我们就会变成好欺侮的对象，任人宰割的羔羊。帝国主义狮子决不会同社会主义羔羊躺在一起，让社会主义羔羊慢慢地、和平平地通过经济竞赛来消灭帝国主义。不，我们必须把自己建设成更强大、更凶猛的狮子。新西兰共产党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让我来谈谈公开论战的问题。新西兰共产党在早期曾经号召停止公开论战，因为我们认为当时公开进行论战是有害的。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不肯同意。我们会要求举行一次世界会议，用客观的辩证的态度来讨论争论的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一些党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后来的情况怎样呢？苏共中央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者坚持要公开论战，并继续这样作。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对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苏共一面像鸽子那样同帝国主义头子温言细语，一面却向全世界宣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是变节者和叛徒。他们在公开发射了这些重磅炮弹以后，曾经稍为安静了一个时候。然后，一九六二年底和一九六三年初，在欧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举行了一系列的党代表大会。他们再一次发动了公开攻击，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的代表采取了可耻的、非同志式的态度，其顶点是赫鲁晓夫在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破口大骂，以及欢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代表。

然后出现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呼吁，虽然他们自己还是继续进行公开论战。这种呼吁，他们提了不止一次，他们说，让时间来解决问题和证明谁正确吧。

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不能停止公开论战。现在争论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些党的前途，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前途，关系到人类的前途。



現在，只有修正主义者放棄他們的修正主义言行，才可以停止論战。如果他們不这样作，我們將受到大損失。关于“让時間来解决問題”的說法，那算是什么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呢？馬克思主义的整个实质意味着必須积极帮助解决問題。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誕生，我們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我們應該帮助創造这个新世界呢，还是像修正主义者所要求我們的那样袖手旁观呢？

現在談談，他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求停止公开論战。这不过是一种詭計。他們的策略是，瘋狂地发射出所有可能发出的子彈，到处毒害人們的思想，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者，然后說：請你們不要使用你們的重武器，現在我們大家都停手，让時間来解决問題吧。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党员和支持者开始看透了他們的修正主义，看出修正主义將导致失敗，而不会导致胜利，对于这种情况他們并不感到那么高兴。他們害怕答辯。他們害怕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动的攻势。他們要大家对他們繼續搞修正主义保持沉默和等待時間来解决問題。不，我們不能接受这种建議。我們的世界性运动必須对爭論的問題进行探討。必須援助和支持各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前澳共中央書記处書記、一位重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爱·弗·希尔最近訪問了新西兰。我們該怎么办呢？对他置之不理，而只同修正主义者会谈嗎？不，为了发展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我們要在新西兰和在全世界，在正确的原則基础上同任何人会谈。我們也就是这样做的，尽管有一些修正主义者显然认为他們是得到八十个党声明的保护的；根据他們对声明的解釋，我們不能同別人而只能同他們会谈。

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必須发动攻势，迫使某些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领导让它們的党员不仅能够讀到和研究今天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議論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議論那些反对修正主义的人的，同时也能讀到和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怎么說的。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一貫向自己的党员提供一切已知的事实和各种不同的意見。我們党已把去年九月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就爭論中的意識形态問題进行双边会谈时的发言，即我們党的观点，发給每一个党员去研究。但是我們的作法同修正主义领导人不同，我們不只提供我們自己的观点。我們同时也把参加会谈的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所讲的每一个字发給了全体党员。此外我們把我們代表团回到新西兰以后所作的經我党中央通过的一个报告，也发給了全体党员，在这个报告中，我們說明了为什么我們不能接受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所提出的观点。我們还广泛散发了表达各种不同观点的各国党的文件。我們还鼓励人們取得在新西兰惠灵頓市的苏联公使館所散发的关于意識形态問題的材料。我們不禁止自己的党员閱讀和研究修正主义者的言論。为什么有些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不这样作呢？为什么他們不把苏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羅馬尼亚党代表大会以后召开的布加勒斯特會議的真实情况告訴自己的党员呢？为什么他



們不把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個黨會議上不得不進行辯論的問題實實在在地說出來呢？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害怕廣大群眾知道事實。難道這是馬克思主義嗎？馬克思主義者什麼時候抹煞、歪曲或迴避過事實呢？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必須探討和研究全部已知的事實。在考慮了各個方面的意見以後廣泛地進行公開討論，將會迅速地導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所以，修正主義者才採取目前進行的謾罵和封鎖的策略。

我們決不要因為面臨這種情況而感到沮喪。完全用不着這樣。今天，千百萬人正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在研究社會主義在一系列國家中取得勝利以後所出現的問題。他們正在拋棄這種唯心主義的幻想，即以為在社會主義取得勝利以後，階級鬥爭、矛盾、對立面的衝突，必然不再是進步的动力了。他們也正在得出這樣的結論：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改變；在資本主義世界裏爭取社會主義和擊敗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首要因素仍然是階級鬥爭而不是階級合作。

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隊伍激昂慷慨。新的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花朵將要開放，這將保證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讓修正主義者去大叫大嚷吧！讓他們去玩弄陰謀詭計吧！我們堅定不移，我們知道只要修正主義還在我們的世界性運動的某些重要部分佔據統治地位，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就不能最後擊敗世界帝國主義。

你們都聽到過關於個人迷信的事吧。關於這個問題，我有許多話可以說。農村工作失敗，麵包不足，工業出問題，文學作品低劣，繪畫一團糟，等等，都說是由於個人迷信。什麼問題都是由於個人迷信。當然，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就逝世，此後，長期以來一直是赫魯曉夫當政，而他們却不說明這一點。

同志們，

最後請允許我為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而向他們致敬。這種立場鼓舞了無數的人，鼓勵他們在世界各國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戰鬥。

我們知道，群眾創造歷史。我們過去和現在所處的时代，都表明了這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正確性。但是，在每一個时代，偉大的思想家和領袖都起了他們的作用。在我們的世界性運動中，情況一直是這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是列寧和在某種程度上的斯大林，他們的創造性思想和實際活動就是我們的榜樣。在我們今天所處的时代，當我們不僅面臨着必須堅守階級鬥爭的基地作為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實行變革的动力這個問題，而且也面臨着如何處理社會主義社會裏仍然存在的衝突和階級鬥爭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又有了一位偉大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領袖——你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無產階級的历史將會用金光閃閃的字來記載他的和你們黨的功績，而渺小的現代修正主義領導人將被扔進他們應該去的地方——历史的垃圾箱。



把思想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

本刊评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结政治工作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和正确处理这四个关系的“四个第一”的原则。这些原则，无疑地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篇文章准备着重谈一谈思想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指出：我们的“进步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在于向人们“贯注”“进步的政治精神”^①。“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②

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即中国工农红军创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著名决议中，就提出红军的建军路线，必须是首先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军，必须在军队中树立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决议使中国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而成为一支政治上坚强的、真正的人民军队。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军队一直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且在这方面不断地有新的创造。他们组织思想工作队伍，人人做思想工作，军事行政干部也不例外，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不断提高全体人员的无产阶级觉悟。千百万普通的工农劳动者，许多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人民军队的教育和锻炼，逐渐革命化起来，成为有觉悟的经得起考验的战士，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

人民解放军的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无疑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宝贵财产，它对于我们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十分有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思想、理论在历史发展中有重大的作用。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而人的活动是要受思想支配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旧的、落后的、或者反动的思想，阻碍社会的发展，或者把社会拉向后退。先进的、革命的思想，则促进社会的发展，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00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5页。



促进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新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任务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它们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而在下述的情况下，甚至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就是：当着社会发展已经提出新任务，而一般群众还没有理解这种新任务的时候，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这时候，革命思想、理论的创立和宣传就成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了。革命思想的宣传愈深入、广泛，革命运动的规模就能愈迅速地发展壮大。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列宁也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②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创建任何事业，都要从思想建设着手。也就是说，我们能否做好工作，能否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决定的，要看人们的思想状况如何，要看人们按照什么思想去行动，这种思想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革命工作，要由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来做。而革命思想，又是要由革命政党、先进的革命分子来传播的。

过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首先是通过宣传革命思想，唤起群众觉悟，从而组织群众，为夺取革命胜利而自觉进行斗争。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还需要把宣传革命思想即从事思想工作这一项，列为首要的任务呢？

我们的党已是执政的党，领导着全国政权，运用国家权力进行工作。行政事务和经济工作日益繁重。许多工作，也需要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去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人觉得，似乎只要依靠权力、命令，只要依靠组织上的领导，只要埋头于经济业务，而不必着重做好思想工作，不必过问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状况如何，也可以完成任务，或者认为，只要在政治运动期间做一些思想工作就够了，不必建立经常的系统的的工作。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这里向我们提出的，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是否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政党仍然必须把宣传革命思想即从事思想工作，列为首要的任务。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继续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继续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使他们自觉地、一心一意地、生气勃勃地干革命，干建设，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0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页。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特别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是很复杂、很尖锐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清除人们头脑中留存的各种旧思想和旧传统，同它们彻底决裂。无产阶级如果不取得思想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

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目的是为了促使群众继续革命化。这就是要使群众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和其他一切旧思想、旧传统，而使他们真正理解到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是否能够不经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权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就自发地、自然而然地提高觉悟，增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呢？他们能否单凭自身力量，达到自己的不断革命化呢？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社会，单就它的内部情况来说（它的外部还受资本主义的包围），它是刚从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它在许多方面还保存着旧社会的痕迹。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①特别在思想领域方面是如此。也正如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②。资产阶级思想除了在人们头脑中留存下来以外，还通过各种形式（例如某些文化遗产）精巧地、颇有吸引力地保存下来，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继续散布它的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为彻底消灭产生旧思想的经济基础，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群众，创造了社会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原来的小生产者，一方面，他们从剥削制度的压迫下和私有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觉悟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他们又程度不同地受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缚，他们的精神面貌还带着不少旧社会的残迹。社会主义制度比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社会主义是摆脱剥削、贫困、落后和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这是他们看得到、体验得到的。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某些新东西还不大习惯，而几千年的旧东西、他们所习惯的东西，还在不同程度上对他们发生影响。只要一有机遇，幽灵似的旧思想，不仅是资本主义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又会在有些人的头脑中复活起来。这些人有时看一场包含有思想毒素的旧戏，重温这种旧思想，要比接受一种新思想、新观点，觉得习惯得多，自然得多。因此，单以一般群众、特别是原来处于小生产者地位的人们的自身状态来说，在复杂的阶级斗

① 《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3页。

②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354页。



爭环境中，在一种情况下，即在加強无产階級思想教育的情况下，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放松以至放棄无产階級思想教育的情况下，也可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

就是那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人，也并不天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要把他們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年青一代，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們成长于新社会，一开始就接受新社会的教育，这是他們的优点。但是，正因为他們在新社会成长起来，不懂得旧社会，不真正懂得人如何压迫人、剝削人，也就是不真正懂得階級和階級斗争，这样，他們也不能很快真正了解新社会如何产生，应当如何建設，他們不能从比較中認識新社会。这又是他們的弱点，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在复杂的階級斗争环境中，他們是比較地缺乏免疫力的。因此，如果不注意對他們的教育，他們同样会受旧社会死尸的熏染，会接受旧时代遺留下来的各种东西中所包含的坏思想的影响，甚至錯把它們当作珍貴的东西看待。事情也是同样的，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一种情况下，即在加強无产階級思想教育的情况下，可以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放松以至放棄无产階級思想教育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俘虏。

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要的，决定的，还是无产階級政党和无产階級政权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还是要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万能的精神武器。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思想教育，在目前，比过去任何时期显得更加重要。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說过：“問題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階級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沒有中間的思想体系（因为人类沒有創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說来，在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离，都意味着资产階級思想的加強。”^①

列宁的这个科学論断，不但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階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

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书中，这样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②

这就是說，不論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着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存在着馬克思主义思想和各种非馬克思主义思想、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对立。所不同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階級的思想体系，各种非馬克思主义思想和

^①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1—352頁。

^② 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頁。



反馬克思主义思想，占据統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資产階級思想的活动和傳播、它对馬克思主义的进攻，往往采取公开的、赤裸裸的、明目張胆的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則是无产階級的思想体系，馬克思主义思想，占据着統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資产階級思想的活动和傳播、它对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攻，就往往采取各种隱蔽的、伪装的形式。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階級思想体系、馬克思主义思想要巩固地保持住統治地位，并不是只需要依靠无产階級的政治統治权力和物质力量就够了，而必須通过不断的思想斗争。无产階級思想体系要承受几乎是整个世界（不仅仅是国内）有史以来各种旧思想的联合压力，受它們的包围。資产階級思想体系虽然退出了統治地位，但它仍然是一种強大的势力，特别是，它采取了各种隱蔽手法，同无产階級思想体系爭夺地盘，为資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这就使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尖銳化。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产階級則力图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的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要經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真正解决。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即无产階級思想体系和資产階級思想体系的对立，而胡謔什么“全民的”即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体系，这不过是有意欺騙。这是企图偷偷地取消无产階級思想体系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統治地位和指导地位，而恢复資产階級思想体系的統治地位，为資本主义的复辟創造条件。

很明显，在社会主义社会，問題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放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傳播，无产階級思想不去占领陣地，資产階級思想就会去占领陣地。哪里无产階級思想占领陣地，压倒了資产階級思想，那里就会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伸張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气；哪里資产階級思想占领陣地，压倒了无产階級思想，那里就必然死气沉沉，必然会鬧出許多烏烟瘴气的事情来。

向群众宣傳革命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促使群众不断革命化，要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形式去做，要在当前的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运动中去。关键的問題，在于干部思想的革命化，也就是不断提高干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因为向群众宣傳革命思想，加强思想领导等等，是要通过干部来做的。干部思想的不断革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领导作风的改进，领导工作的加强，是群众不断革命化的一个必要前提。

我們国家有一个广大的干部队伍。他們的思想状况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經過較多的革命鍛炼，有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的則比較缺乏鍛炼；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新手，剛参加工作不久。但是，不論哪一种干部，都需要不断提高，不断革命化。

国内外形势在不断发展。許多新的任务、新的問題摆在我们面前。今天的階級斗争、生产斗争，都不同于过去的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問題更多了，斗争更加复杂了。以階級斗争



一項來說，我們中間有些人，總自以為是懂得較多的。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的階級關係和各方面階級鬥爭情況究竟是怎樣的，階級鬥爭以什麼形式進行，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相互關係又如何，——對於這些問題，有些人口頭上懂得，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或者在道理上懂得，一達到具體問題時就糊塗起來，甚至會迷失方向，過去讀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在這種情況下往往被忘記得一干二淨。經過最近幾年的鬥爭，我們不少同志才逐步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認識；特別經過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更使人們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因而依然存在着產生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但是，應當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中間許多人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這門大學問，還是知之甚少，在這方面還遠遠不能說已經掌握了毛澤東思想。

因此，需要重新鍛煉，重新學習。需要新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的革命實踐中，在同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作鬥爭中，重新鍛煉自己的思想，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中間，也要學習各種反面教員所提供的材料，包括現代修正主義者和老修正主義者的著作，以及帝國主義評價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弄清楚在當代許多重大問題上，現代革命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怎樣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現代修正主義者是怎樣搬用老修正主義者的謬論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以便增長思想上政治上的識別力和免疫力。所謂鍛煉思想，也包括改造思想方法在內。這就是要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警戒和克服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使人們看不見事物和形勢的變化、發展，打不開自己的眼界，因而，在思想上往往固步自封，自滿自足，安於現狀。任何人，如果不重新學習、重新鍛煉，就會落后；不繼續革命化，就有可能蛻化，甚至可能接受修正主義。

斯大林說得好：“在國家工作和黨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中，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結果也愈有效力；反過來說，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誤和失敗也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會愈加變為鼠目寸光的小人，墮落成為一些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務主義者，而他們也就愈容易蛻化變節，——這要算是一個定理。”^①

幹部思想繼續革命化的工作做得有成效，我們領導機關的工作就會有生氣，領導工作也就愈有成效。

各級領導機關，包括國家經濟領導機關，目前主要是領導國家建設。這種領導的主要對

^①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0頁。



象是什么呢？是领导成片成片的土地吗？是领导成堆成堆的机器吗？但是，土地是要人来种的，机器是要人来使用的。没有人，土地和机器都是废物，都不能发挥作用。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首先还是要领导人，做好人的工作。经济领导机关，要正确处理人和土地、机器及其他一切生产手段、劳动对象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经济工作就无法真正做好。所以，各级领导机关都要面向群众，面向实践，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把工作真正迅速、具体、及时地做到群众中去，做到基层去，做到生产第一线去，克服任何形式的事务主义、官僚主义，只满足于发布行政命令而放松思想教育，以及拖拉疲沓等作风。要做到这些，毫无疑问，应当从干部思想继续革命化的工作着手。

我们的国家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来为它服务，促进它的发展和巩固。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思想状况，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这一部分的上层建筑革命化了，才能促使上层建筑其他部分革命化，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充分地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学习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是出于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军队工作，比起其他工作来，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需要强调高度的集中，强调纪律性和服从命令。但是，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因此就认为可以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恰恰相反，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并且把它做深、做好，数十年如一日。这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尽管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进行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形式、要求等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应当有所不同；但是，通过经常、系统的政治工作，向广大群众和干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使干部继续革命化，群众继续革命化，等等，则应当是共同的，各个部门不能例外。所谓经常、系统，就是政治工作不能单单依靠政治运动，不能一劳永逸，不能是即兴式的，也不能只是由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去做，行政领导人员可以不做，而必须是找寻比较系统的办法，人人负责，在一整套办法中，又要紧紧抓住思想工作这个中心环节。

做好思想工作，一句话，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威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威力，归根到底，要建筑在发挥人的威力的基础上，建筑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基础上。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地发挥人的威力，充分地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做好工业企业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

· 李野 ·

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党支部，三年来，以阶级教育为纲，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使人不断革命化的思想工作。白云石车间的工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大大提高了革命觉悟，正在逐步地锻炼成为一支具有革命觉悟、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的工人队伍，一支像解放军那样，能够吃大苦、耐大劳，能够打硬仗的队伍。这个车间党支部，是一个与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战斗堡垒，是北京市工业企业基层单位思想工作的一面旗帜。

工业企业车间党支部应该做什么工作和怎样做工作？对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还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只抓住了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天天忙忙碌碌，但工作效果不大。另有一些同志，虽然抓了思想工作，但是，抓得很肤浅，所以也不解决多少问题。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工作的

特点在于，他们紧紧抓住了思想工作，并且紧紧抓住了阶级教育，因此一抓就灵。他们抓的内容正确，方法对头，效果就大。

阶级教育，是使工人群众革命化的根本工作，是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阶级教育是需要长期进行的。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斗争，就有进行阶级教育的必要。有些单位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忆苦思甜和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有些单位组织老工人向青年工人讲了厂史、家史，激起了青年工人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这些都是阶级教育，无疑是必需的。但是，如果阶级教育只做到这里为止，那就远远不够了。阶级教育需要不断地抓下去，绝不能一抓就停，或者是抓抓停停。党支部应当把阶级教育当作思想工作的长期任务和主要内容，抓准，抓狠，抓透，坚韧不拔，一贯到底。要把阶级教育工作抓深抓透，在进行阶级教育的过程中，还需要组织工人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把工人群众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样，才能使阶级教育步步深化，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政治思想好，能够用革命者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使自己更加革命化，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

要有效地进行阶级教育，就必须把这一工作深入地、广泛地做到人们的生活中去，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抓活的思想、活的材料，要善于引导工人群众通过具体事例去认识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人群众具体地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正确的行动，什么是错误的行动。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采用这种



方法，就能够使工人群众便于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精神，便于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能够更好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有效地提高阶级觉悟。

白云石车间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还在于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关心群众，而且从生活上关心群众。他们把从生活上关心群众：当作是做人的工作、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做好每个工人本人的和家属的工作。这对做好车间思想政治工作有重大意义。

有的同志往往把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同关心群众的生活分开，特别是当群众的生产情绪高涨的时候，更容易这样。这是不正确的。党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群众的革命干劲越大，就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党越关心群众的生活，群众的革命干劲就越大。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的工作经验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几年来，这个车间的干部，遍访工人家庭，问寒问暖，又经常住工人集体宿舍，跟工人们谈心，给工人解决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残、婚丧嫁娶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个车间党支部的同志说得好：“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关心群众提出的任何细小事情，群众也就把自己的一切问题，包括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心里的话，告诉了他们。正因为这样，白云石车间的工人深深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加了革命干劲。

白云石车间进行阶级教育，从开始到逐

步深化的经验，雄辩地说明，阶级教育工作做得越深入，工人的阶级觉悟就越高，革命意志就越旺盛，不断革命、自觉革命的精神就越得到发扬；阶级教育工作做得越深入，工人队伍就越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认清是非，站稳立场，经得住严峻的考验。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①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做的这一切，就是使群众齐心的工作，就是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它奋斗的工作。经验证明，只要群众团结起来，并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那就会产生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巨大力量。

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的工作做得好，不仅是因为他们正确地抓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对头，而且还因为他们有着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

首先，这个车间党支部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党委的指示上，有着雷厉风行、抓深抓透、一贯到底的劲头和韧性。他们善于结合自己车间工人的思想实际，主动迅速地开展工作，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把党委布置的各项工作，归结到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归结到使人革命化这个最根本的政治任务上来。善于把最主要的工作狠抓不放，一抓到底，做不彻底决不罢休，不论上级党委检查或是不检查，都能够照样坚持下去。这就是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

^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7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车间党支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从白云石车间可以看出，干部参加劳动，是能否做好工人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有些同志在谈到参加劳动时，总是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白云石车间的干部却克服了困难。他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们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通过跟工人同劳动、同生活，他们和工人群众建立了血肉般的亲密关系，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了如指掌。正是由于依靠对实际情况的深入细致的了解，他们才能够认清矛盾，找到方向，掌握主动，解决问题。也正是由

于他们同工人群众建立了血肉般的关系，车间党支部在群众中才享有了很高的威信，能够在工作中一呼百应，上下齐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

解放军的基层战斗单位是连队，工业企业的基层生产单位是车间。每个工业企业做好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生产的根本保证。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的工作经验是可贵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工业企业的党组织，都能把工作的根子扎到基层，使每一个车间党支部的工作都能做得像白云石车间党支部那样，或是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的工人群众，必将锻炼得更为革命化，生产积极性更高，我们的工业企业必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车间党支部

张 高

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是一九五八年成立的新车间。几年以来，这个车间被连续评为厂和公司的先进单位，最近又被评为“五好”车间。这个车间的生产之所以搞得好，最主要的原因是，车间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他们坚决贯彻执行了上级党委的指示，积极参加劳动，关心群众生活，抓紧做人的工作，抓活的思想，特别是坚持地反复地进行阶级教育，不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白云石车间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炼钢转

炉用的炉衬砖。车间刚成立的头两三年，设备比较简陋，拌料等重活都靠工人用铁锹干。车间的通风设备也不好，烟雾腾腾。并且，工人又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或商业部门新来厂的，有些人在这种劳动条件下干活不习惯，个别人甚至不安心工作。当时，车间领导一面千方百计保证完成了紧张的生产任务，不断提高了产品质量，一面发动大家改善劳动条件。厂党委和车间党支部也不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大家认清打砖的重要性，为这个先进集体打下了基础。但是，有



些人的情緒总沒有完全稳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把人的工作做好，是摆

在当时厂党委和車間党支部面前的一个迫切問題。

一 从参加劳动入手，干部跟工人打成一片

一九六一年，新来的党支部书记刘瑞田，按照厂党委的指示，从参加劳动入手，跟工人同劳动，同生活，了解情况，发现矛盾，解决问题。

刘瑞田第一次参加劳动是在供料組。当时，車間工人还不知道他是新来的党支部书记。供料組长要考驗考驗这个新伙伴，就叫他跟自己一块儿提料。刘瑞田一天运了七吨多料，比組长干的一点不少。組长和其他工人都說：“这个新伙伴干得不軟。”

第二天，刘瑞田仍去找供料組长要活儿干。就这样，他經常同工人一起劳动。

几天以后，当工人们知道刘瑞田是党支部书记的时候，都觉得这位书记不简单，真干，是个好劳动者，是个好干部。

由工长提拔上来的車間主任、党支部委员高升，是出名的生产能手。他和刘瑞田一起，哪里活儿累、活儿难，哪里生产上有問題，就到那里去干。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原来那些不安心工作的人也逐步安心了。他們說：“书记、主任跟咱們一样挨熏流汗，沒說的！”

通过同劳动，干部和工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工人把干部看作自己的知心人。工人对生产上的建議，对干部作風的批評，都

可以无顾虑地提出来。有一个时期，高升修訂操作規程，坐办公室的时间多了，参加劳动的时间少了，但規程修訂得并不順利。有的工人就对他說：“怎么，高升变成高官了！”另一个工人摸摸他的脑壳說：“老高，你的烏紗帽呢？”高升这才警觉起来，并且問自己：“怎么，我要把老战友全丢了，要跳光杆舞嗎？”他馬上提个小兜子，带着記錄紙，到了生产第一綫，跟工人一块儿干活，一同研究操作規程，結果，規程修訂得更加切合实际，工作进行得更順利了。

几年来，刘瑞田、高升等克服了各种困难，一直坚持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在白云石車間已經成为习惯。他們通过同劳动，跟工人打成一片，摸清工人的思想，了解事情的底細，商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們把同劳动、同商量当作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刘瑞田和高升都感到，不参加劳动，不接近群众，不了解群众的具体思想問題，就不能調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他們依靠群众的智慧，解决了生产上的不少难题。拌料工人五次改进拌料机，使放置两三年的所謂“廢物”投入了生产。反射炉工人連續采取九項措施，把煤耗降低一半以上。一九六二年秋天，車間领导正为打磚工序搞两班生



产人力不足而发愁的时候，老工人史继仁在回家的路上，向刘瑞田提出一个两班改一班的办法。車間领导研究了這個建議，觉得很好，实行之后，不但完成了生产任务，而且节约出十六个劳动力来。

近两年来，白云石車間不断接受新的生产任务。前年增加了白云石炉和白灰炉，去年增加了矽铁炉。任务新，工人新，就会有新的問題。矽铁炉的生产开始很不稳定，刘瑞田、高升和車間副主任宋根旺，冒着炉前的高温，分头跟班劳动，从中发现工人的思想問題和设备問題，并加以解决，結果降低了炉前温度，减少了事故，提高了产量。

白云石車間的干部，不只跟工人同甘共苦，而且积极主动地跟工人一起改善劳动条件。厂部批准拆除厂房和休息室之間的墙，扩大厂房，流通空气。刘瑞田就拿着锹，高升就拿着镐，同工人一起把墙拆掉。接着，干部又和工人一起修盖机械化料仓。大家奋战了二十一天，一个容量一百吨的料仓建成了。过去倒运白云石，每班七个棒小伙子忙不过来；现在，一个工人一开料仓閘門，白云石就嘩啦啦地落在皮带运输机上运走了。后来，厂房又安装了新的通风排尘等设备，劳动条件不断改善，工人搞好生产的信心更加提高了。

二 关心工人生活，把思想工作做到家屬身上

当工人生产情緒越来越高漲、干劲越来越大的时候，上級党委一再囑咐白云石車間的干部：工人越是鼓足了勁搞生产，领导越要关心工人的生活。炼鋼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等干部，多次到集体宿舍，跟工人談心，帮助工人打扫卫生。党委书记銀重华，是个女同志，身体也不太好。但是，当白云石車間的工人到采石場去支援修路工程的时候，她騎車跑了三十里路，到現場去看望大家。在上級领导干部的带动下，白云石車間的干部認識到，不能只管生产，不管生活；要想彻底了解工人的思想情緒，在同劳动之外，还必须跟工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当单身工人住在一个条件較差的宿舍的时候，党支部决

定干部尽量搬进这个宿舍，帮助工人改善住宿条件。

有一天，工人王仲回到宿舍就嚷了起来：“誰搬到我的鋪上来啦！”原来他发现自己的鋪盖变了样。可是，仔細一看，被子床单还是自己的，只不过洗得干干净净的，跟早晨上班时不一样了。原来是高升拿回家去，让自己的爱人洗干净，中午拿回来鋪上了。

白云石車間党支部的同志，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着工人的生活。工人生活方面有了困难，干部和党员們都积极主动地帮助解决。打磚工单文斌，在結婚前几天忽然愁眉不展。党员李树仁一問，原来是新房漏雨，



他怕来不及修理，耽誤了婚期。李树仁等十几个同志，就利用星期天的時間幫他把房抹好了。工人史继仁的父亲死了，車間知道这件事后，高升跟工会主席宋海南、工长王凤元、工人王春生等人，在夜晚十点多钟，用板車把棺材幫他运到家里；第二天，刘瑞田又跟王凤元等同志用板車把灵柩送到墓地安葬。

一九六一年，公司党委号召做好工人家屬工作，訪問工人家庭。白云石車間党支部认真貫徹执行了这个指示，有計劃地安排了这一工作。这个車間的工人住家在北京城区和近郊区的有六、七十人，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人去訪問过几次。在規定的家庭訪問日，車間党支部、行政、工会、团支部的干部，全体出动，分片包干，不管酷暑严寒，風雨无阻。上級党委檢查这件工作的时候，他們是这样做的；上級党委不檢查的时候，他們仍然坚持这样做。訪問工人家庭的工作一直坚

持进行，已經形成了制度。工人家里如果发生了夫妻鬧气或婆媳不和等糾紛，干部們也前去劝解，帮助解决。工人家屬从外地到厂子来看望，干部們就热情招待，介紹工人的生产情况和工作意义。有一次，打磚工武志祥的父亲从涿县来看他，当时老武正在班上，离不开，高升馬上到厂門去，把老大爷接到宿舍，介紹了武志祥的进步情况。第二天刘瑞田又陪着老大爷参观了工厂。老大爷原来不願意老武当打磚工，这次来是想把老武找回去的，但是，当老大爷知道了工厂的不少事情以后，原来的想法改变了，不提叫老武回家的事了，反而鼓励老武好好地干。車間干部从老大爷嘴里，知道老武的爱人也不願意老武当打磚工，因此就給她去封信，請她到工厂来看看。她来厂以后，刘瑞田、高升給她介紹了老武的情况，說明了打磚的重要性，她的看法也转变了，不再瞧不起打磚这种工作了。

三 由忆苦思甜到树立革命人生观，階級教育坚持不懈

白云石車間的干部在跟工人同劳动、同生活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工人、特别是有些青年工人思想上还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一些青年工人既不完全了解旧社会的苦根，也不真正理解新社会的甜源。因此，車間党支部十分重视階級教育，并且把这一工作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这个車間，系統的忆苦思甜的階級教育，

是从一九六一年春天开始的。党支部請那些解放前受苦最深的老工人和老貧农，讲家史，談身世，在全体工人中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提高階級觉悟。

工人藍斌朋首先讲了解放前人間地獄的“煤黑子”生活。接着刘瑞田讲述了幼年在唐山当童工、受尽日寇摧殘的种种慘痛經歷。藍斌朋身上被把头毒打留下的伤疤，刘瑞田



冒充大人上班的悲惨模样，以及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情景，激发了大家的阶级感情。于是，在小组会上，在宿舍里，工人纷纷谈家史，讲身世，互相启发，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党支部又请参加过部队的几位同志，向大家讲述解放军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战胜强敌的革命斗争故事，用解放军的英雄气概鼓舞大家的革命精神。

青年拌料工刘华明，小时候他的父亲给地主当过长工，自己跟姐姐卖唱乞讨过活。解放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而他却把过去的苦丢到脑后去了。他进厂后，嫌工作不如意，干活吊儿郎当，被称为“调皮大王”。这时他听了老工人的诉苦，想起了过去的苦生活，思想开始有了一些转变。为了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党支部又请他姐姐来帮助他。他的姐姐把他带到从前要过饭的农村，讲述他们当时给老乡们卖唱的凄凉情景，使他痛切地回忆起幼年的悲惨生活。刘华明从许多人的诉苦中，知道车间里有好几个人过去也都要过饭，更多的人受过同他类似的苦难。他从回忆个人的苦进而认识到阶级的苦，终于醒悟过来，进步很快，并且被评为“五好”青年。

青年打砖工石速贵，原来嫌工作条件差，不安心工作。可是，他听了转业老战士们的报告以后，思想起了变化。解放军那种舍己为人的光辉形象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禁问自己：“解放军有这种舍己为人、移山倒海的壮志，难道我就被这点困难吓跑？解

放军用小米加步枪能战胜强敌，难道我就不能同大家用双手改造白云石车间的劳动条件”？他下定决心，留下来，和大伙儿一齐改造这个车间。他还向大家表示决心说：“瀝青烟熏得黑我的脸，可熏不黑我的一片红心！”以后，他干活儿一直很起劲，被评为“五好”青年和先进生产者。

但是，什么事情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阶级教育需要不断进行。白云石车间有些工人，在进行阶级教育时，阶级观念比较明确，但教育过后，时间一久，他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又慢慢淡薄下去，忆苦思甜激发起来的劳动热情，在有些人身上开始减退；同时，车间里的老工人不断输送出去，新工人不断补充进来，这些新来的人也并不都理解新社会的甜和旧社会的苦。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在工人群众中经常地、反复地进行了阶级教育。他们抓住车间里的活人活事活思想，用新旧社会对比的办法，举办各种小型报告会。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工会主席就给大家讲“五一”节的来历，讲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事迹。车间里安装了抽风机，改善了劳动条件，车间主任和老工人就对比新旧社会，给大家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工人赵守荣的子女多，车间工会给他发了困难补助金，他同“老伴”和四个孩子开个家庭会，讨论这笔钱是怎样来的，全家都体会到党的关怀和新社会的温暖，孩子们学习更加努力。党支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就请赵守荣向大家讲为什么举行家庭会，从而使更多的工人



受到教育。

许多党员、团员和老工人体会到阶级教育的好处后，积极启发新来的工人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这是做好车间阶级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环。新来的青年工人张龙，一到车间就嫌活又脏又累，心里不自在，干活懒洋洋，休息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他却溜边，一声不吭。老工人、党员郭来看出了这小子有心事，就不断跟他聊天。两人越聊越接近，张龙讲到，他父亲过去打过短工，还参加过打日本鬼子。郭来跟他说：“张龙啊，你爸爸打短工，我扛过长活，我还要过饭。咱们过去都是受苦的人。有些罪你没摊上，可是过去的苦日子不能忘。你爸爸当年打日本鬼子是闹革命，咱们现在搞生产也是闹革命。你得想想，咱们怎样才能保住无产阶级的江山？怎样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郭来的话，深深打动了年轻人的心。张龙到郭师傅家去谈了好几次，有一次一直谈了三个钟头。在郭师傅的帮助下，张龙逐渐转变，干活积极起来了。

经过一年多比较深入的阶级教育，白云石车间工人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当初不安心工作的人，也不走了。

为了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入一步，把工人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特别重视组织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的头脑。在车间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车间的干部、党员、团员和工人，在不长的时间内，积极地、自愿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在学习中，人们联系车间的真人真事，互问互答，开展讨论。因此，学习成绩显著。通过对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和讨论，大家进一步懂得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在树立革命人生观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许多同志说，只知道新社会好，只有报恩思想还是不够的，眼光还必须远大，还必须要进行不断的革命斗争。这样，才能够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白云石车间工人的阶级觉悟越来越高，革命干劲越来越大。党指到哪里，他们就干到哪里。党支部组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职工们积极参加，风雪无阻。党委号召节约，全车间的工人，每人都带上节约手册，认真地节约原料、材料，捡拾有用物资。白灰炉工人在煤耗已经

完成指标的情况下，还在气温和风力合适的时候，少添一两块煤，节省煤炭。为了提高生产，打砖工勤学苦练，使炉衬砖的质量不断提高。白云石车间的工人，不只是月月出色地完成了生产计划，而且在支援兄弟单位的工作中，也总是拣重担子挑，提前完成任务。



加強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

东方明

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論，从根本上說来，就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我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承认只有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才能使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但是，要真正掌握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論，在历史研究中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經過一个认真的艰苦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真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結合历史研究工作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展开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用馬克思主义理論武装我們的史学工作队伍，也是馬克思主义在历史領域占領陣地的一个基本条件。

我們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成績是很大的。近几年来，历史問題的討論，例如历史人物评价問題的討論，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問題的討論，是相当活跃的。有些同志写出了有价值的历史专著和論文。有些同志在搜集、整理、注釋史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績，为进一步的研究創造了条件。在史学方法論方面，有的同志結合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对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論进行了批判，并且結合我們自己的历

史研究工作的經驗，对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論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討。但是，就整个情况看来，我們的史学界对于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还是注意不够的。对于曾經在中国史学界有影响的几个資產階級史学流派，还没有作出系統的分析 and 批判。結合我們历史研究工作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系統地研究和闡述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論也做得不够，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专著，这方面的論文也很少。关于史学方法論的討論，也是比較少的。看来，加強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是提高我們历史研究工作的质量，提高我們史学工作队伍的一个关键。

勤勤恳恳地搜集、整理、注釋史料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受到尊重。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应该加強。有些擅长这一方面工作的专家，分工专搞或着重搞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的历史研究工作，絕不能限于整理史料。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归根到底，是为了闡明历史发展的規律，从而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如果不是在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工作，也有可能走入迷途。我們的史学工作者应该不断地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武装自



己，逐步学会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利用花費了許多心血搜集、整理和注釋的史料，从而概括出历史发展的規律。

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界提出了許多以前未曾提出过的中国历史上的問題，发现了若干以前未被注意的史料，大力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观点，展开了爭辯。这是一个好現象。无疑的，这应该繼續和加強。但是，从爭辯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情形：固然有些具体历史問題的长期爭辯不得解决，主要是由于史料的掌握还不够；但是有更多的問題，却是由于或主要是由于爭論双方在史学方法論上，或者在运用史学方法論上存在着原則分歧，而不得解决。有些具体的历史問題，爭論双方所引用的史料相同，而对史料的解釋、得出的結論却很不相同，甚至相反，正是表明了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提高到方法論上进行研究和討論，具体的历史問題的爭辯，就不能深入下去。

科学的历史表明，对于方法論問題是不能忽視的。忽視方法論是經驗主义的一种表现。恩格斯在晚年曾經針對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状况，說过这样一段話：

“的确，蔑視辯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論的思惟多么輕視，可是沒有理論的思惟，就会連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就会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唯一的一問題是一个人的思惟正确或不正

确，而輕視理論显然是自然主义思惟的最确实的道路，因而也就是不正确思惟的道路。”^①

恩格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所說的这段話，无疑的，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也是适用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一味埋头于史料，忽視理論思維，忽視方法論問題，对于具体的历史問題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結論，而且会不自觉地陷入资产阶级的思維方法，用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論来观察历史問題。

认为只要从史料出发就能坚持唯物主义，这是不正确的。保存下来的文献史料，大都是地主阶级知識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識分子記載下来的，这些史料未必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在关系到阶级利害的問題上，他們的記載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偏見，以至完全歪曲事实。所以，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如果輕視理論思維，忽視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指导作用，不仅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連两件事“也联系不起来”，而且还会誤信歪曲事实的史料，被剝削阶级的偏見俘虏。这就是說，在阶级性很强的历史科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指导作用更加重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之下，对史料做出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引出历史发展固有的規律性，才能把握历史真相，按着历史的本来面目解釋历史，坚持唯物主义。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頁。



没有一定的方法论作指导的史学家，实际上是沒有的。在历史研究工作中，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就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指导。不过有的是自觉地运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有的是不自觉地陷入这种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所以，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破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

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肃清它在史学研究工作中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在旧中国，梁启超、何炳松等人，曾经大量贩运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我们不能认为，它的影响已经肃清了。最近就有人发表文章宣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个别史观，认为历史科学只是研究一个一个的个体，而不能也不应该去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仅此一例，就可看出，批判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彻底摆脱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的影响，是何等必要了。

在力图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中间，有时候不自觉地离开唯物史观，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要熟练地把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研究工作中去，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就是把我們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论，从方法论上进行探讨，带着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弄清何种做法是正确的，何种做法是错误的。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史学界就在历史研究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历史主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几年来关于許

多具体历史问题讨论的继续，特别是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和中国农民革命战争问题讨论的继续；就是说，这是把許多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集中到方法论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一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史学界应该把这一讨论深入下去，通过这一讨论，从方法论上总结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武装我们的史学工作队伍。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我们认为，在这一讨论中，需要着重探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列宁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①。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这是包括历史研究工作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历史研究工作的实际证明：对于历史事件做出科学或比较科学的说明的，都是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历史研究工作中的方向性的错误，则无一不是这样或那样地背离了阶级分析方法。文明社会的历史，是

① 《論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34页。

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阶级斗争，是历史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或历史方法，就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语），这就是说，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阶级斗争环境，从当时的阶级对立及其演进中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绝不是与阶级观点对立的。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是这样或那样地违背了阶级观点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强调了阶级观点。正确地运用阶级观点，不会产生非历史主义倾向。所以，史学界的这次讨论，应该集中地探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如何牢牢把握列宁所说的“基本的指导线索”，亦即如何拿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这个基本的指导线索，也应该是这次史学方法论问题讨论的基本的指导线索。否则，讨论就抓不住要领，就会陷入五里雾中。

在讨论中弄清有关的基本概念是必要的；但是，应该防止陷入单纯概念的争辩。我们认为，应该把关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同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就是说，从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问题，来探讨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历史主义。这种探讨，可以对几年来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问题，做综合的、概括的理论阐明；也可以解剖一只麻雀，把某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论提高到方法论上来研究，例

如曹操评价讨论中的方法论问题，关于明末农民战争讨论中的方法论问题。防止陷入空洞的概念之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防止把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运用阶级观点、历史主义的讨论，引向或者变成个别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和史实的争论、考证。无疑的，个别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和史实的争论、考证，要继续进行，但是决不能用它来代替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例如不能以隋炀帝这个人物的评价之争，来代替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的讨论。否则，就会引导到忽视方法论。而忽视方法论，就会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陷入史料的汪洋大海，失掉方向。

结合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和讨论如何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正确运用阶级观点、历史主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我们的史学工作队伍，克服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非阶级观点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掌握唯物史观，准确掌握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是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一个的问题，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历史研究工作，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

毛泽东同志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



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做到这样，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①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是一切理论研究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它的精神对于历史研究工作也是完全适用的。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来说，就是要详细地占有史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引出正确的结论，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来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反对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现象罗列、堆集史料的经验主义。

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是一个以“矢”（马克思主义）射“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详细地占有史料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指出占有史料的重要性，绝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史学工作队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历史领域的大海里航行的指南针，如果没有这个指南针，就不可避免地要迷失方向，花多大力气也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既要努力发掘史料，更

要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分析史料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结论，是从客观材料引出来的事物固有的规律；结论既经得出，如马克思所说，它就变成了指南。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向着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历史领域进行研究的唯一科学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才能正确地分析史料，并且能够具有对于史料的敏感，抓住重要的关键性的东西，而不致使自己淹没在史料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

就历史研究工作的现状来看，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的史学工作队伍，强调研究史学方法论，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就不能提高。强调这一方面，对于加强史料工作，提高史料工作的质量，也是大有好处的。

我们希望，目前史学界正在进行的关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能够引起更多的史学工作者注意研究史学方法论，系统地探讨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肃清它的影响。我们希望，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和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方面，出现一批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论文和专著。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领域占领和扩大阵地，肃清资产阶级史学著作和史学观点的影响，为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802页。



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

楊 均

积极地、尽可能地从各个方面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革，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充分发挥投资的作用，使技术改革取得最好的效果，必须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

农业生产，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的实施和试验研究成果的应用，都需要注意研究其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主要地是计算分析在一定的经济和自然条件下，采取某种农业生产技术措施，是否在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这是整个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技术改革，它一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农业生产实践中所提出的技术问题，要由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部门去研究和解决。另一方面，它也是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需要从经济上来考察技术改革的合理性，对实现农业技术改革计划提供有数据的、有科学分析的意见和建议。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要应用于农业生产实际，充分发挥其

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必须通过技术经济的分析研究，提供完整的经济依据。如果仅仅有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而没有对新技术的经济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就不能够正确判断它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因而也就不了解在某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应用和推广这种技术，是否能够获得最好的经济效果。通过经济效果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有助于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而且还有助于对新技术的进一步的研究与改进。

在农业生产上，采用改良的耕作方法，能够使产量提高，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改革任何一项旧技术，采用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是很复杂的，它关系到多种因素。拿选用农业机具来说，目前农业机具的种类，有旧式的手工工具，也有现代化的农业机具。现代化的农业机具又有很多种类和牌号。究竟在某一地区、某一生产单位，选用哪种动力机械及与其相适应的农具，才能够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就要考虑到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如考察当地的地形、地势，土壤的性状；当地土地利用状况，水田还是旱地，地块是大还是小；种植作物的种类，耕作制度；生产单



位的規模和經濟狀況；等等。只有对当地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以及其他有关的因素进行綜合的、全面的經濟分析，对不同的农业机具的經濟效果进行比較，最后才能选出对本单位來說經濟效果最好的农业机具。

在一定时期，一定生产水平的条件下，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資是有限的。我国的国土广大，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很复杂。根据各个地区具体的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合理地使用国家分配的资金，是农业技术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各种农业技术措施和实施技术措施計劃的各种方案，因地制宜地进行經濟评价，才能为合理使用投資，充分发挥有限投資的效果提供依据，使技术改革更加切合各地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使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在充分合理利用現有有限投資的基础上，取得农业增产的最大的經濟效果。

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还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本身更快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从来就是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就可以明确在具体条件下，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具体需要，这也就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发展方向，从而为农业科学技术更好的发展，創造有利条件。

以上表明，做好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考察某一项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經濟效果，还能够为国家的重大

技术措施提供确实可靠的經濟依据，帮助国家确定技术政策，在充分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农业增产的速度，促进农业科学技术更快的发展。可見，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在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必須把这一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

要做好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根据我們的体会，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必須从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农业技术改革的經濟效果，为有步驟地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提供經濟依据。

全国解放以后，农村經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农民已經走上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在农业上，現代化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总的來說，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还比較低，最新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还比較少。为了大力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經濟，加速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就成了当前的迫切任务。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必須从当前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逐步改革过去小农經濟时代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使之逐漸轉到以現代技术和科学成就为基础的軌道上来。比如拿平整土地來說，过去因为小农是一家一戶进行生产，就形成了很多小块土地。在农村已經实现集体化以后，在进行大面积引水灌溉的新灌区，就会发现，尽管一眼看去是很多块很



好的平地，而实际上在这些地里都是高低不平的，灌水后往往会形成低处积水，高处看不见水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提高作物产量和土壤性能自然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说明，新灌区即使堤埝渠系的工程作的很好，如果平整土地的环节跟不上去，不能很好地克服过去小农生产技术措施的影响，仍然会限制新技术的经济效果的充分发挥。

但是，也必须看到，千百年来，我国广大劳动农民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生产经验，形成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农民的这些传统经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有其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和经济上的根据。在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和吸收农民的优良的传统生产经验，提出有效的农业技术改革的措施，而且要不断进行科学总结，发扬和丰富这一优良传统，使之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轻率地否定农民群众多年积累的传统经验，就会给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生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对待任何一项农业技术改革，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既要从科学技术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又要从经济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技术改革的顺利发展。

做好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还必须注意农业劳动手段的内在联系。同时，要对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综合的经济分析，才能正确地评价技术改革的经济效果。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和动

物。农业劳动手段是由两类不同性质的东西构成的，一方面除了来自太阳的光和热等自然因素以外，有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性质的东西（如农业机具、水利灌溉工程、肥料、农药和生长刺激素等）；另一方面又有生物学性质的东西（如动植物种及其有机体和土壤微生物等），并且后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有许多既是劳动手段，又是劳动对象。作为农业劳动手段的各个因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农业劳动手段复杂错综的内在关系，可以用农业生产中的土为例来说明，它包含着量和质两个方面。在量的方面，它具有不同的形状和面积；在质的方面，它具有不同的性状和肥力。没有一定的面积，作物群体就没有生长的基地；没有一定的肥力，作物个体的发育就没有保证。然而土之所以能成为农业劳动手段，又有赖于机械力学的劳动手段以土为对象实行的加工。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进行土地加工，能够提高工效，节省人畜力，加深耕层。但是使用机械进行耕作，除了要协调机械与劳畜力的关系外，还要从技术和经济方面要求土地在形状和面积上，具有最小的坡度和长宽适当的作业区，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机械效能，减少耗油量和机械磨损。另一方面，土地要求农业机械，除了加深耕层以外，还必须提高土壤的理化性状和肥力。如果一方面不能适应另一方面，或双方面不能相适应，新的技术就会造成新的矛盾。例如，北京市郊区的某些土壤就不适宜用重型犁耕作。因为这类地区春



夏两季都需要淺耕，如用重型五铧犁进行耕作，不仅机体重，拉力大，耕垡块大，而且在淺耕时犁沟深淺不一，不适合水澆地的农业生产要求，必須用輕型犁耕作，才能适应土壤特性。在土与农业机械的关系上，如何适应土壤的特性，相应地进行农业机具的选型配套，是农业技术改革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解决的重要問題。

在实行机耕的条件下，土与肥的关系也必然发生新的变化。为了适应机械作业和电力排灌的要求，土地必須进行平整，而土地平整，耕层加深之后，新翻上来的下层生土还有待进一步的熟化，在生土未熟化以前，因肥力不均，作物的生长发育就会受到影响。为了加速熟化和培肥加深了的耕土层，达到連續稳定增产，相应地增施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就成为同农业机械化密切相連的重要措施。同时，即使新的耕层熟化以后，連續增施肥料也是不可忽視的。这就要求在实行机械化的同时，必須相应地增加肥料（包括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的施用量，使机械化与增施肥料两者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的增产潜力，取得最好的經濟效果。这也說明，考察农业技术改革的經濟效果，不能孤立地去进行，必須把各种农业劳动手段有机地联系起来，綜合地进行考察，才能够較确切地看出农业技术改革的增产效果。

在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中，还必须統一考虑当前效果和长远效果、货币效果和实物效果。由于看到某些农业技术改革

当前效果較小，或者从货币計算上看經濟效果較小的現象，就得出农业技术改革“不合算”的結論，是錯誤的。

应当看到，农业技术改革需要相当长的時間，它不是在頃刻之間就可以实现的，只能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逐步实现。在实现农业現代化以前，机力和人畜力并存，新旧农具結合，傳統耕作栽培經驗和适应現代化条件的耕作栽培措施相互交錯采用。这些錯綜复杂的現象，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于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因此，在实施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要使机力和人畜力、傳統耕作經驗和新的耕作技术很好地結合起来。但它們之間有时候也可能产生矛盾。有的技术措施可能有利于当前的生产，但从长远的經濟效果来看，未必有利。也有的技术措施从长远来看，經濟效果很大，当前效果并不显著。例如，以种植业的机械化情况來說，在东北的某些地区，由于尚沒有与壟作制度相适应的耕作机具，不少作业不得不用“洋头土尾”的方法进行，即人扶土犁，拖拉机牵引。很显然，“洋头土尾”的耕作，当然沒有完全机械化的耕作效果好，甚至还存在某些使用人力較多，經濟效果較小的情形。孤立地来看，这似乎是不合算的。但是应该看到，使用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它有助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就是在当前，只要加强对新旧农具的合理調配和劳动力的合理組織工作，就能提高工效，为适时地进行耕、耙、播、收和为增产提供有利的条件。只有把当前效果和长远效果統一考虑，进行全面



地考察和研究分析，才能够对采用机械耕作的经济效益作出正确的判断。

实行农业技术改革，是为了保证不违农时、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使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的提高。这就要求在实行农业技术改革时，既要注意增产，又要注意降低成本；既要注意实物效果，又要注意货币效果。在农业技术改革的实践中，也有这种情形，由于某项新技术的使用和投资的增加，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提高了，与此同时，农作物的生产成本也提高了，甚至增产部分的收入，还不能补偿成本增加部分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是在继续稳定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新技术呢？或者是因此就得出农业技术改革“不合算”的结论，从而拒绝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呢？严肃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应该是善于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找出新技术还不完备的地方，改进它，使它更加完备，而不是因为它有某些缺点就否定它。就拿旱改水、平整土地实行水利化来说，无疑这是促进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平整土地，进行水利建设，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资金，投资需要经过一定时期，才能逐步收回。平整土地也必然会翻上来部分生土，这对当年或近期的产量，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根据一些人民公社近年来平整土地的经验，在菜田水肥充足的条件下，生土在第二年末或在第三年就可以基本赶上熟土的产量水平，旱田在第四年末或第五年也能赶上熟土的产量。虽然在平

整土地的最初一、二年里，农作物的产量会受到一些影响，成本也会高一些。从长远来看，货币效果和实物效果又是统一的，因为经过平整以后实现了水利化的土地，无疑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它能在长时期里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保证农作物持续的高产稳产。所以，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化，以为只要是技术改革就能够立刻以新的技术体系代替旧的技术体系，或者简单地从一时一地的效果出发，就作出某项农业技术改革“合算”或“不合算”的结论，这样都不会对农业技术改革的经济效果作出正确的评价。应该根据对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技术改革过程中技术结构的特点和农作物实物增产的意义的深刻认识，勤奋地进行研究工作。

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虽然在性质上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但是它同有关的自然科学部门关系很密切。因此，农业经济科学工作者，除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外，还要深入洞察农业生产过程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掌握其中各种不同的技术环节，不同技术因素之间的经济关系，认真地占有大量的实际材料。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经过分析研究，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以促进我国农业技术改革的迅速实现，使我国农业转到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来。

（作者附志：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何桂林、艾云航、杨福慧、范远谋、王松鹤等同志的帮助）



南斯拉夫有着怎样的“创作自由”？

· 牧 惠 ·

资产阶级历来总是拿缺乏“自由”作为攻击和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借口。面对着这种攻击，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绝不因资产阶级的攻击和诽谤而放棄这个原则，绝不允许反动的阶级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竭力鼓吹和提倡“自由化”的政策。在文艺领域中，他们崇拜西方的“自由”艺术，主张同各种资产阶级的艺术流派“和平共处”，疯狂地攻击那些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人。

在这当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叫得最早，嚷得最响。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文艺领域中，一直标榜着所谓“创作自由”，来同社会主义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相抗衡。臭名昭著的南共纲领这样写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张使科学和艺术有真正的创作自由。……我国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作用不要成为对科学艺术的各种流派、学派和风格进行武断裁判的作用。”

在其他的许多著作中，他们又都不厌重复地一再宣传这些滥调。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就是对“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实用主义的歪曲”，就是把“艺术变成日常政治利益的手段”；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批判在文艺领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对“艺术的各种流派、学派和风格进行武断裁判”；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出于幼稚的手段所产生的”“荒谬指示”。他们断言，只有南斯拉夫的“创作自由”，才是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的良好药方；而坚持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就是“教条主义”，就是对文艺创作施加“官僚主义的限制”。

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辩论什么叫做自由，究竟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文艺创作中有真正的自由，是徒费唇舌的。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看看在南斯拉夫这个挂着“创作自由”的幌子的国家里，到底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有创作的自由，这种“创作自由”到底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吧！

铁托集团所标榜的“创作自由”，是现代修正主义“自由化”政策的内容之一。这种



“自由化”政策，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套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开放的政策。

在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领域里，确实有着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没有见过的“自由”。

而最“自由”莫过的，是美帝国主义文化，西方腐朽文艺泛滥的自由。它们在南斯拉夫实际上占着统治地位。

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在南斯拉夫的自由，充分暴露了铁托集团所吹嘘的“创作自由”的实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一贯执行着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文化上，美国新闻处和它在贝尔格莱德的阅览室可以对外开放；美国的书籍和报刊，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发行；南斯拉夫的广播、报纸以及其他宣传工具，有向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亲美宣传的义务。一九六〇年十月，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又通过了《报刊和其他新闻报道形式法》，规定南斯拉夫“新闻自由”和“外国报刊自由进口”。

这些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些“自由化”的政策，正是美帝国主义“文明”得以“自由”推销、“自由”泛滥的基础。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英国《观察家报》报道的，“西方文明”在南斯拉夫“极受欢迎的”盛况：“书店里陈列着西方的著名作家和受欢迎的作家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译本。这些作品通常在西方出版后一年内就翻译出来了。剧院的保留剧目中有着大批西方剧本。电影院上映的多半是

西方影片，最受欢迎的是‘西部片’，往往满座。”

翻翻南斯拉夫的报刊和出版物，人们就会知道，这些所谓西方的著名作家和受欢迎的作家所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些“西部片”宣传的是怎样一种美国生活方式。在南斯拉夫的报纸中，有不少经常连载一本或两本翻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侦探、犯罪和色情小说。西方各种各样腐朽堕落的书刊，在南斯拉夫市面上到处可以买到。至于西方电影的泛滥，只需要举一两个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南斯拉夫共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影片一千零三十九部，占进口影片的百分之七十八，其中美国影片占进口影片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六。

这种情况，叛徒铁托也直认不讳。铁托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南斯拉夫青年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南斯拉夫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翻译和出版过如此多的各种腐朽的西方作品。二月六日，铁托在另一次讲话里又承认：“在我们这里翻译各种黄色文学。大量地翻译并且出版它。”

如果以为铁托说了这番话，是表示他准备对这种“自由”施加某种限制，那就是对铁托推行“自由化”的政策决心估价过低了。铁托在一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一方面固然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批评了一下文艺领域中的奇形怪状的现象，一方面就同时表示：“当然，在这里不能谈论某种行政干预”。即使如此，这些不着痛痒的批评，仍然引起那些尝到



“自由化”甜头的人不满。铁托可以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意見，可以将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党人关进监狱、集中营；但是，他却不能不考虑这些要求“自由”的呼声。铁托所执行的政策，就是代表这样一种要求、为这种要求鳴鑼开道的政策。他不可能反对这种要求。同时，他更不能不考虑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因此，铁托在二月六日的讲话中就急忙声明：“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应该进行某种反对西方的圍攻。在西方不应该认为，这是旨在反对西方文化，因为我们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

事情非常清楚，在南斯拉夫，不保证西方文化——具体点說，即美帝国主义腐朽沒落反动的文学艺术有横行无阻的自由，那是不可想像的。它既不符合美帝国主义的要求，也不符合铁托集团的利益。虽然他們有时候也反对那些对他們用处不大的抽象派、过分黄色的东西，那不过是裝飾門面罢了！

“我們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铁托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地、最好不过地透露了南斯拉夫在“創作自由”旗号下到底贩卖了些什么貨色。

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創作，的确有着那些在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沒有的“自由”。在南斯拉夫，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頹廢派的創作观点是非常自由的，形形色色的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等的“創作自由”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这种“創作自由”，同南斯拉夫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资本主义复辟是相适应的。它是资产阶级所要

求的意識形态“自由化”的組成部分，也即是资本主义“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的組成部分。

人們可以看到，资本主义要在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复辟，总是要从意識形态入手的。它千方百计地使用“自由化”的手法，包括“創作自由”的手法，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意識形态，建立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意識形态，用这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意識形态来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經濟服务。

从南斯拉夫的报刊出版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从内容到形式都拚命地向沒落的西方文化学习，向腐朽的西方文化看齐。他們不仅翻譯而且創作了許多色情小說，大量地在报刊上連載，在出版社里印行。爵士音乐已經取代了南斯拉夫的民族音乐而居統治地位。抽象派更成为南斯拉夫美术的主要流派并得到官方的奖励和支持。誨淫誨盜的电影也得到充分的“創作自由”，以至于《战斗报》、《世界报》都不得不承认，“在报刊上，在电影院的銀幕上，在小店鋪的櫥窗里，在剧院的广告栏里，都有性的泛濫”。

为了适应他的修正主义政策的需要，铁托还给艺术家們在宣傳修正主义謬論方面以充分的自由。例如，他們有在文艺作品中大肆宣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人幸福”的自由，宣傳那种为了“个人幸福”，可以不惜背叛革命的所謂思想，也即是南共綱領那种所謂“个人幸福”不能服从于任何最高目的的观点。他們有反对一切正义战争，包括



反法西斯战争的自由。他们有诽谤革命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他们有宣传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厌世思想的自由……。在他们那里，端的是没有“指令式的官僚主义的乐观主义”，也没有“对悲观主义眼光狭小的迫害”；“没有个人主义责难的威胁，也没有因为形式主义而受到指责”。总之，他们有宣扬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宣扬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自由。

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他们怎样描写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士吧！

先看拉里奇的《决裂》。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杜塞里契，是反法西斯的一名游击战士。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去宣扬主人公那种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信心，他怀着一种阴暗的绝望心情去思索他目击的一切。他觉得斗争没有目标，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因此，他在游击队处于困难的关头，向敌人缴了械，带着一支人马做了俘虏。后来，他从集中营跑了出来，到了希腊游击队那里，却仍然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作家笔下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形象。作者写出了这样的人物，并不是为了批判他，而是企图说明，杜塞里契之所以向德国法西斯投降，那罪过全在于一次曾经为了什么事批评他的党内会议，在于游击队员不照顾杜塞里契的病态的自尊心……。这样，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和叛徒，倒是值得同情的人了。

又是这个拉里奇，他在另一部反映反法

西斯战争的小说《莱列伊斯克山》中，描写了另外一些游击队员，他们仍然是仇恨一切人的孤独者。这本书出头叙述一切的人不时地叫嚷：“我们互相厌倦，我们变粗野了，像树木、像石头一样麻木不仁了”，“孤独是事物的自然状态”，“生活中充满了孤独”。为什么他那么孤独呢？《战斗报》一篇关于拉里奇的文章替他作了切合作品实际的注解：主人公的孤独感“是来自战争造成并带来的特殊情况。面临着在森林和山洞里的追捕，对乡村和山谷——死神在其中窥视着他——的疑虑，他越来越被恐惧、猜疑、对自己的力量的不信任所笼罩。”据说这就是表明“拉里奇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最尖锐的控诉，反对把人动物化，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在战争中都成了豺狼或猛兽。”

在他们的作品里，同革命热情格格不入，连谈一下斗争的崇高目标也使他们觉得好笑的人，全是正确的，全是好人。相反，他们总是把共产党人、革命战士描绘成不惜任何代价拼命取得极权的凶手。在他们的笔下，这些“凶手”只不过是狡猾地运用一种神圣的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危害自己的人民。这些“凶手”参加革命决不是为了人民，为了什么伟大的理想。这些“凶手”什么人也不爱，什么东西也不珍惜，他们只爱自己。这些“凶手”渺小而虚荣，怯懦和愚蠢，只不过是可笑到极点的简单死板的狂信者，无情的暴虐者。在别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在极力



誹謗革命者，他們对无产阶级专政有着何等刻骨的仇恨！

以上这些作品，又都同时散发着那种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厌世思想的臭味。但是，在无产阶级看来是臭的东西，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却是香的。例如，他们承认，在他们“自己时代的诗人”马代·保尔的诗中，充满了“生命和生活的悲剧”，“失望情绪”，“黑色”的、“一种无言的悲观主义和消逝的东西”，“无能的悲哀和把握不住的内心的呻吟”，“是死亡和恐惧、人的绝望的清晰的幻影”。评论家在对马代·保尔的诗作出这样的结论，并且认为这种暗淡的东西“一般来说它也存在我国（南斯拉夫）现今的诗歌中”，之后，他竟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不对头的，不好的东西，因为“对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人来说，这便是他的哀歌的基调”，而诗人写出这样调子的诗歌，倒是在“提醒人、警告人”呢！

.....

要了解南斯拉夫在文艺方面有着怎样的一种“创作自由”，只要看看这几个方面，也可以从一斑而窥全豹了。

这些“自由”，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确没有。但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稀罕这种“自由”吗！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允许这种“自由”吗！

毒草有自由，香花就没有自由。有为修正主义服务的自由，当然也就没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服务的自由；有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自由，当然也就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自由。南共纲领早就伏下这样一笔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也反对这样的‘理论’，即以抽象的自由观念为名在实际上取消科学艺术创作的真正自由，使它从属于反动的政治倾向。”话说得含糊其词，闪闪爍爍，但那意思是明白的：“创作自由”只能从属于叛徒铁托的修正主义政治倾向，“创作自由”必须受叛徒铁托的反动政治的控制。一句话，只准有宣传资本主义、宣传修正主义的自由，不准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自由。如此而已！

一九六三年在南斯拉夫出版的小说《娜嘉》所引起的一场风波，多少透露出这所谓“创作自由”到底是怎样的行市。

《娜嘉》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娜嘉（记者）和编辑、诗人、军官、经理等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黑暗堕落。小说通过人物的语言和活动告诉读者，在南斯拉夫，“金钱和追求地位代替了许多理想”，“真诚受到压抑、束缚，甚至还是有害的”；在南斯拉夫，正直的作家受到打击和迫害。书中的诗人把南斯拉夫作协俱乐部称为“鸡窝”，“因为在那里原则被烤肉片所代替”，虽然批评家是“别人的书中的常见的寄生虫”，可是他们却想主宰南斯拉夫文化的命运。小说中的一个失业青年更愤怒地说：“我们的消遣音乐……确实与光荣的无产阶级毫无联系。这是可耻的。这是我们的殖民地精神和农奴气质的一幅可怜的景象”。小说还通过



少校軍官的口說，南斯拉夫的經理是“首要的工作者，也是头号的罪犯。一部分人得奖，另一部分人却在担負盜用公款的責任”，南斯拉夫的世界基础是“經理”。娜嘉通过南共負責机关被介紹到報館工作，她虽然是有夫之妇，但为了便于工作，却隱瞞了这一点，因为在南斯拉夫“出嫁了的女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而姑娘却处处受人欢迎”。尽管報社編輯、軍官、經理等人都知道娜嘉是有夫之妇，但是他們却仍然千方百計地追求娜嘉。報社編輯甚至无耻地說：“我知道，搞到漂亮女人，正如得到自由一样，往往也是踩过死尸的。”

《娜嘉》这本书写出南斯拉夫的某些社会問題和文化界的丑事，多少透露出铁托集团修正主义政策的恶果和真面目，因此，官方报刊和御用評論家馬上就向它发动攻击。《战斗报》、《政治报》和《共产主义者周报》都发表文章，攻击作者“想以文学作品的外衣来掩飾自己非文学的意图”，用的是“阴謀家的措詞和潜在語”，称它为“誹謗书”。由《娜嘉》这样一部小說所引起的一場風波是如此，至于那些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家，“創作自由”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什么，就是不难想見的了。

事实是对現代修正主义者吹嘘的所謂“創作自由”最有力的嘲笑。資產階級一向吹嘘資本主义世界是最“自由”的国土。可是，人們都知道，在那里是怎样一种黑暗的殘暴的統治。同时，人們也知道，在那里，即使資產階級自己，也并不是很自由的。历史发

展的規律老是同他們鬧别扭，现实生活总是从各方面同他們的“自由”鬧别扭。在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統治下，文艺好像不再服从什么“官僚主义的限制”了，可是，人們都知道，他們的所謂“自由”的文艺，不但必須服从現代修正主义的要求，而且还得服从資本主义經濟法則的支配。

甚至铁托自己也承认，“商业主义”是目前南斯拉夫文化事业面临重重困难的原因。

在反动政治控制下的“自由”，在資本主义經濟法則支配下的“自由”，这就是南斯拉夫“創作自由”的真实写照。

为了保证“創作自由”，铁托集团反对无产階級对文化出版事业的政治領導，主張“在教育、科学和其他文化机关、研究机构中建立和发展社会自治制度，使教育、科学、艺术和一切文化生活摆脱国家的行政压力和对于文化生活、文化創作的国家极权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南共綱領》）。根据这个原則，一切文化单位都“既是經濟机构，又是文化机构”。这一切似乎都非常美妙，“創作自由”非常有保证了。但是，由于铁托实行了这样一种实质是資本主义性质的反动政策，賺錢就必然成为出版企业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既然出版西方的黄色作品比出版南斯拉夫的作品更能賺錢，又没有誰對他們进行“官僚主义”的干預，那么，出版商当然不願意“冒險”。于是，有的出版社許多年都不出版一本南斯拉夫的作品，而一些資本主义的所謂旺銷书刊又竞相出版，不厌重复。

既然資本主义已經在南斯拉夫复辟，那



么，文化当然也成为一种“必需的罪恶”，图书馆的经费少得可怜，文化经费又用在大量购买抽象派、现代派的艺术品上。于是，在南斯拉夫那里，香肠比莎士比亚更受人欢迎，爵士乐演奏者、资本主义流行歌曲演唱者等等所谓“实用艺术家”比一个作家还要赚钱，模仿西方的广告画、商标图案的设计更能比艺术作品获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现象了。

在这个“靠笔杆生活”已经成为一种痛苦的“光荣”的国度里，为了适应“商业主义”的原则，作家艺术家们或者靠亲友关系出版自己的作品，或者以标新立异来互相竞争，或者更进一步迎合西方出版商的口味，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自己的著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即使如此，南斯拉夫的专业作家艺术家也仍然一年比一年少。

列宁早就说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所说的绝对自由都是假的。在以金钱的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春宫

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①

铁托自己也承认的“商业主义”，恰好说明南斯拉夫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所作所为，都不外乎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而且是最反动的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铁托集团和他们的御用文艺家老在那里为他们有着什么“创作自由”而沾沾自喜，老在那里吹嘘“创作自由”给他们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自由”，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繁荣”！现在，他们早已经在那里无可奈何地谈论着文艺的危机了，这倒的确是对他们的“创作自由”的绝妙注脚。

^①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页。



不可救药的“肌肉僵化”症

洪 谷



“超等国家似乎已经变成了超等无能为力国家”，这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三日美国资产阶级杂志《斯通双周刊》一篇评论美国的困境的文章中的断语。这种对于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衰落的哀鸣，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

一九六三年五月，正是美帝国主义企图扑灭老挝人民爱国正义斗争，在老挝大肆捣乱的时候，这家杂志看到了，老挝人民毫不在于美国的“最可怕的火力”，而同样，在南越、在古巴等等地方，那里的人民也都不把这个“拥有如此多的武装”的凶恶敌人放在眼下。原因何在？因为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肌肉僵化的巨人”。

现在，据说这个“巨人”又“突然发现自己在全世界各地受到打击”，而“小不点的国家都可以踢美国一脚”，（《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甚至叫它“卷铺盖滚蛋”（《芝加哥太阳时报》）。

“小小的加纳正在闹着反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小小的巴拿马……感到强大和重要到足以攻击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小小的塞浦路斯不要美国派兵”干涉它的事务（《芝加哥太阳时报》）；

不止如此，更为“小小的”桑给巴尔，也居然敢把“美国的最后一位外交官……从那个岛屿上赶了出来”；（美联社）

而在“我们牵连很深的南越，正在成为一个我们愈来愈没法解决的问题”（《芝加哥太阳时报》）。

几十年前，老罗斯福敢于自夸：“我拿过来了巴拿马”，而今，“金陵王气黯然收”，美帝国主义的这股“威风”，已经被扫荡得一干二净了。

压迫要引起反抗，反抗会遭到新的压迫，新的压迫又必然要引起更大的反抗和斗争。这不是周而复始的圆形循环。在这种来回往返的斗争中，暂时貌似强大的腐朽力量同暂时似乎弱小的新生力量，总是不断在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加纳人民和巴拿马人民的斗争，塞浦路斯人民和桑给巴尔人民的斗争，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美联合斗争，越来越迅速地促进这种情况的变化，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正在猛烈地向前发展。用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的话来说，现在，“这种情况远不止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流动的潮流”。

肯尼迪曾经鼓吹：“美国不应该是带着但



是的第一，或者带着如果的第一，或者带着时间的第一，而应该是一个干脆就是第一的美国。”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夸下这样的海口，为时不过三年多，世界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小不点的国家都可以踢美国一脚”，这又一次生动地

证明了美国统治集团的“美国第一”的帝国主义思想的彻底破产。多行不义必自毙。“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历史属于充满革命活力的世界人民，什么样的“主义”、“计划”或“战略”，都无法医治美帝国主义的“肌肉僵化”症。

爬不出死胡同

秋 阳

美国的宣传机器最近显得特别繁忙而紧张，它们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严重挫败，连续不断地进行报道、预测和评论。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李普曼最近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题为《今天和明天，这个难办的世界》的文章，就是这场哀歌大联唱中的一支曲子。

李普曼无可奈何地承认，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遇到巨大困难”。他开列的“麻烦的单子”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使美国统治集团“头痛”的事，到处都有“折磨着”它的问题。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处境，加剧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内部的矛盾。他们互相抱怨，互相攻击，闹得乌烟瘴气，一团混乱。他们中的一些人，责难约翰逊“举棋不定”，不是“强有力的总统”，把失败的原因说得好像只是约翰逊的无能。

李普曼站出来为约翰逊开脱和辩解。他

特别把美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务院，说什么美国今天“对外政策的基本麻烦是国务院拟订出那么多以未加研究的前提为根据的政策”，说美国国务院“窒息着”对美国政策进行“任何彻底的重新检查”。

且不讲美国国务院是在总统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就拿“重新检查”来说，战后美国的历届政府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过，什么“计划”、“战略”也是一个又一个地提出了的。为什么这些“计划”和“战略”没有能够挽救得了美帝国主义日益衰落的命运呢？李普曼的这句话倒是说得有点道理的：美国的许多政策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这些政策是“建立在没有根据的前提之上”，“其中主要的是认为美国像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五年战后时期一样，仍然垄断全球军事力量和可以处置的金融力量”。

但是，李普曼永远不可能懂得，帝国主义制度，早就把美国统治集团牵进了死胡同。



美帝国主义不仅是在失去称霸的“前提”而硬要当世界霸主的今天捉襟见肘，走投无路，就是战后初期，它自认为可以一统天下的时候，它所疯狂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就已经不断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许多绞索，坐上了一座随时可以爆发的火山。美帝国主义今天的失败，正是它四面树敌和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寄生性、腐朽性进一步加深的必然结果。

李普曼这个人，是美国新闻界的“权威”，

在美国政界也有很大影响，素有美国政论家中的“首脑”和华尔街的智囊之称。在他三十多年的谋士生涯中，写了大量的文章和几十本书，为美国统治阶级出了不少主意。而今，却提不出什么使美国统治集团摆脱困境的办法了。他鼓吹要“修订前提”，以“适应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何“修订”？又怎样“适应”？没有下文。其实，不但李普曼开不出药方，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又何尝不是如此。约翰逊上台后，就连肯尼迪

“我们并不想要控制任何人，我们并不是想要收买朋友……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国家得到愈来愈大的独立和自由。”这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在一篇关于“美援”的演讲中说的一番话。

腊斯克这一段话是针对美国统治集团中有人非难“美援”计划的失败而发的。这种批评意见说：“有些得到我们援助的国家批评我们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他们之间的争吵，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最近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有钱难买到朋友的抱怨。例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美国在战后的岁月中付出了大量的美元，企图在非共产主义世界收买朋友，但是，经验证明，收买来的朋友靠不住。

《芝加哥太阳时报》说，“美援”政策已经

使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多少朋友，并且使我们可靠的盟国越来越少。

一个说有钱难买到朋友，一个说我们并不想收买朋友，看来这并不矛盾。朋友本来就不是用美元能够买得到的，而美元也根本不是送给朋友的礼物。

为了应付对“美援”计划失败的责难，腊斯克在同一篇演说里自己揭露了自己：

“国际开发署的经济援助基金现在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如果你把进出口银行的贷款、用于和平的粮食和军事装备包括在内，那末百分比还会高些，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是说，“美援”

为美国垄断资本输出商品开辟了道路，用腊斯克的话来说，就是“援助能刺激贸易”。

“联邦政府鼓励美国私人资金更多地流向不发达国家。”——利用“美援”为美国垄断

美元·链条·朋友

综
林



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劲头也没有了，他除了叫嚷要把破产了的肯尼迪的“总战略”“化为行动”外，别无良策。而在连遭失败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严重的内讧时，他只能出来说些不要“惊恐不安”、“报纸标题的风向计并不是历史的路标”之类强作镇静的话。美国《纽约时报》以低沉的笔调哀叹：今天“华盛顿的富有创造力的政策考虑陷于一种近乎瘫痪的状态之中，除了应付眼前的紧急事件的需要之外无暇他顾。”美国统治集团除

了继续在死胡同里东撞西碰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病入膏肓，矛盾重重，妙手也难回春。当今的美国，很有点像《红楼梦》里冷子兴口中的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一个美国刊物十分恰当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一棵被虫蛀空了的树，随时可能被推倒。挣扎总是要挣扎的，形势比人强，李普曼之流只能徒唤奈何。

资本侵入受“援”国家创造条件，这是“美援”的另一妙用。

“对外援助……帮助我们保护和加强自由世界的实力，而不用我们派人去作战。”——在美国统治集团看来，用美元换取廉价的炮灰，这确实是一桩便宜的买卖。

应当指出，腊斯克抱住琵琶半遮面，他对“美援”的真正目的“坦白”得是很有限的。例如他就不像杜勒斯说的那样“直率”：“我们是不是交了朋友，我是不在乎的。在许多这样的情况中，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做这些事情（按：指美国对外“援助”）是因为将对美国的利益有好处。”

美国《哈泼斯杂志》主编约翰·费希尔在给美国前国际开发署署长汉密尔顿的一封信中说：“美国在援外上每做一件事（或每拒绝做一件事）都是为了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所以我相信，你会在每一角银币上都系上一根链条。如果这个银币不是为清楚地规定好的美国利益花用，你就会死劲勒紧这根链条。”

一角银币，一根链条，这真是赤裸裸的

自我暴露。

《加纳时报》指责，“美国‘援助’总是被用来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工具”和对受“援”国“进行粗暴的讹诈”的工具。

伊朗一个议会成员揭露：美国“给我们贷款，可是每一笔贷款都附加了成百个条件”，“我们收入的一半回到美国的口袋中去了”。

据统计，一九六二年，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只有四十多亿美元，而同年通过“美援”、私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等办法从国外榨取的利润，竟高达一百四十亿美元左右。这的确很像一句谚语中所描绘的那样，他给我们一些骨头，他却拿走了我们的肉。

经济掠夺、政治奴役、军事控制，这就是腊斯克所谓“帮助这些国家得到愈来愈大的独立和自由”的真实内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谈到柬埔寨为什么拒绝“美援”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声称他们是我们的真诚的朋友时是不真诚的。他们只能是假朋友，这样的假朋友不可能对我国有好意”。

